

第三章 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一) 学校南迁,迅速恢复和组建党组织

1937年8月,教育部命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5日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共有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共有教职员148人,其中清华73人。

1937年10月,原清华、北大南下的共产党员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和长沙临时市委的领导。支部书记为周宏明(清华),支部委员为吴磊伯(北大)、郭建(清华)。不久,吴继周(清华)到校,亦增补为支委。组建时共有党员18人,其中原清华党员12人,为:周宏明、吴继周、张华俊、徐贤议、杨少任、黄葳、王天眷、熊向晖、许立群、郭建、蔡承祖、钟烈罅。原北大党员共6人。在长沙临时大学入党的有:池际尚、张韵芝、宋平(宋延平)、陈舜瑶、田方增、杨赓(杨隆誉)、赵石(赵儒洵)、高秉洁8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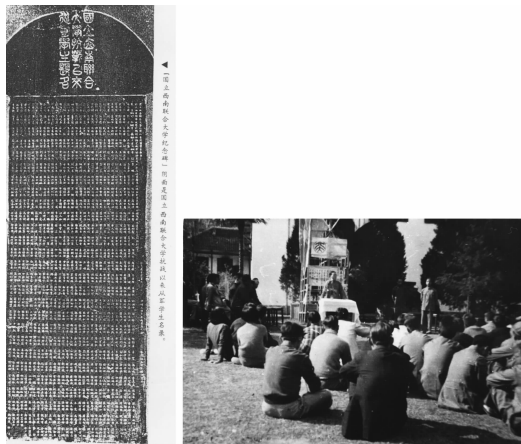
此外,原北大党员何锡麟及在长沙临时大学入党的苏哲文(苏有威),党的组织关系不在临时大学支部而直属于中共湖南省军委。

因而,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在校共产党员共计28人。

(二) 向抗战第一线输送干部

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成立后,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学生在长沙市里进行抗日宣传,演出阳翰笙的话剧《前夜》,不少学生参加了战地服务。1937年12月9日,临时大学党支部发动长沙全市大、中学生联合举行“一二·九”两周年纪念会,宣传当年学生运动事迹,并编辑出版刊物《火线》,向社会发行。1937年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大肆杀戮,临大党支部团结广大同

学,召开了长沙市民反日大会,号召“拿四万万人的行动答复侵略者的趾高气扬,拿四万万人的吼声唤醒‘少数同胞’的麻木”。^① 1937年底,临大党支部邀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到校作报告,报告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必须拿起枪杆到革命队伍里去,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12月31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重要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指出:“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②。这个讲话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传到长沙临时大学,进一步为大学生指明了行动方向。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的战争。联大同学出于爱国热忱,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约8000人,左图为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名者有832人,实际不止此数。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约1100人,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约8000学生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其中还有牺牲的烈士。

右图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欢送从军同学会场。

^① 《火线下》:第12号,原注:“‘少数同胞’指蒋介石集团。”载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编:《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在徐特立和周恩来的讲话之后，临时大学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从军运动。有的同学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行列，还有四五十人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在这些行列中，党员始终走在前列。许立群被党组织派赴重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无线电通讯员训练班学习，并从事地下工作。党组织决定熊向晖、徐晃、池际尚组成党小组（熊向晖任组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工作。随后，熊向晖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任机要秘书，从事地下工作12年，向党中央报告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机密。宋平、何锡麟等前往延安。周宏明、吴继周、郭建、张生力、张华俊等留在湖南、武汉等地开展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开展工作。由于大批进步学生离校，到长沙临大结束时，学生人数由1400多人减至约600人。



熊向晖(1919.4—2005.9)，在校名熊汇荃。安徽省凤阳县人。1936年9月—1937年7月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习。1936年加入民先队，任清华大学分队组织委员兼秘书。1936年12月8日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蒋南翔、杨学诚。曾任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8年获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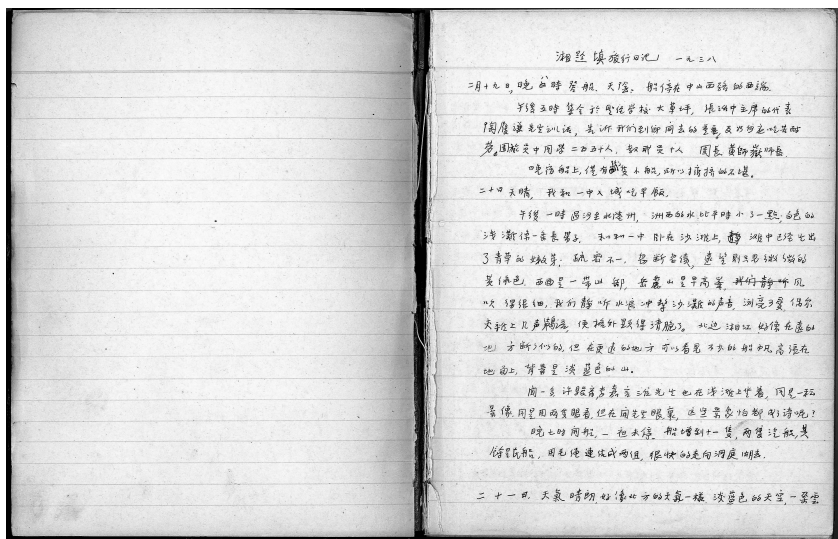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驻英国常任代办、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临大迁校，正值长沙大撤退。迁撤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的黄文杰专程来长沙布置应变。他们与省市商量决定，任命王亚文^①为青年工作特派员，并将长沙临大的一部分党员组织关

^① 王亚文，1925年在湖南入党，1933年入北大经济系学习，1935—1937年在朝阳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到长沙，任湖南省临时军委总干事。

系交给他带到昆明，并布置了工作任务，为后来西南联大建党打下了基础。

(三) 建立西南联大党组织



图为杨式德日记。杨式德，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年底，战火逼近长沙。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第43次会议议决学校西迁昆明。2月，师生分三路赴滇。甲路由约300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的宗旨是“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杨式德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穿越了湖南、贵州、云南三个省，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历68天，4月28日到达昆明。栉风沐雨，翻山越岭，艰难的行程磨炼了师生的身体，锻炼了意志，拓宽了视野。

两个多月的“小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1940年杨式德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5年赴美留学。194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土木工程系主任，结构力学教研室主任，对我国结构抗震抗爆的研究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2016年其子杨嘉实校友将《湘黔滇旅行日记》及32张珍贵的行军照片捐赠给清华大学。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员工由长沙分水陆两路出发，多数人绕香港经海路到越南海防，再乘火车到昆明。陆路由300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实行军事管理，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历时68天，行程3500华

里,于4月28日到达昆明。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共有学生993人(包括在昆明接受的借读生)。

1938年7月,原任北平崇德中学党支部书记的力易周从延安辗转到了昆明,8月,在北平入党的黄元镇、郝诒纯也到了昆明,3人建立了临时党小组,力易周任组长。10月,三人一起考入西南联大,这时在北平入党的徐干(徐树仁)也到了昆明,4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党支部,推选力易周为支部书记。同年12月,力易周发展袁永熙入党。1939年3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这一临时党支部改为西南联大正式的党支部,并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力易周因“金田事件”^①涉嫌,暂停党的关系,而任命袁永熙为党支部书记。

1938年11月,就在力易周为书记的联大临时党支部建立不久,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命的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带着一批党员组织关系,由长沙来到昆明。王亚文到昆明后,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四年级。他根据周恩来、叶剑英、黄文杰布置的任务,在联大立即着手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并指定徐贤议为支部书记,党员有从长沙来的王亚文、徐贤议、张遵骧、汤一雄和从北平来的莫家鼎共5人。不久,发展了张定华、汤德明、张鹊梅入党。1939年5月,汤德明接任支部书记。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先在长江局,后在南方局。

这样,在西南联大建党初期,就出现两个党支部平行并存的局面。

1939年7月,王亚文毕业,到重庆回南方局工作,把自己领导的支部组织关系,通过南方局经云南省工委转给袁永熙领导的党支部。随着联大党员人数的增加,1940年3月,云南省工委决定,联大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下设分支和小组。此时,共有党员83人,约占云南全省党员总数的1/3^②。总支书记为袁永熙。1940年9月,袁调云南省青委工作,由李晨(李振穆)接任。

^① “金田事件”是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一起错案,将金文哲、田克敏二个老党员诬陷为国际间谍而秘密处决。力易周因在陕北公学介绍金文哲重新入党,而长期受到株连。1982年此案平反,并恢复力易周的党籍。

^② 1940年云南全省共有党员247人,见《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年—1950年)》,10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四）“群社”的建立与活动

这时，“一二·九”时期所产生的“民先队”组织成为联大前期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的基础力量。1938年8月，在昆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简称“民先”“民先队”），力易周任队长，郝诒纯为组织部长，徐干、黄元镇、袁永熙为干事。“民先”在西南联大成立了一个大队，李善甫任大队长，地下党员莫家鼎、董凌云均为队部负责人，其成员多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时的老“民先”队员。以后不断发展，到1939年秋队员人数已近百人。民先队骨干基本上都是地下党员。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民先”宣传贯彻的，“民先”在当时联大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1939年暑假，联大党支部书记袁永熙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办的八大学党支部书记学习班。会议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主持。董必武作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林伯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蒋南翔讲了青年运动问题。学习班结束后，南方局接着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听取了袁永熙关于西南联大党的工作以及民先队和当时联大公开的进步社团“群社”活动的情况汇报。会议特别强调，要运用各种合法方式开展活动，以便团结广大中间学生，防止党组织暴露。“这次会议，对此后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①会上在布置工作时，南方局重申了关于撤销“民先”组织的决定。所谓重申，是因为1938年国民党下令取缔“民先”等进步社团的活动，为了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式，更广泛地团结中间群众，避免“民先”成员里的中共党员的暴露，于是，南方局决定撤销“民先”。1939年1月曾向云南省工委作过传达。当时在联大未予贯彻。1939年秋，袁永熙回到联大，再次作了传达并进行贯彻。

1939年底至1940年初，联大“民先”队员经过激烈的辩论，克服了认为后方青年运动太保守，不够轰轰烈烈，对撤销“民先”组织想不通等想法，在党组织反复作工作后，才接受了南方局这个决定。“民先”撤销后，联大党组织又

^① 袁永熙：《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载《云南现代史资料》第1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党组织把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民先”队员吸收入党,大部分则转入“社研”。“社研”成员分成小组,在联大各党分支或党小组领导下进行活动,活动方式比较隐蔽。它宣传贯彻党的主张、方针、政策,组织发动群众与三青团作斗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联大党组织发展党员多从“社研”中选择对象,“社研”成员入党的不少。

1938年底,为了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以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了公开的社团——“群社”,先后聘请曾昭抡、余冠英、吴晓铃等教授为导师,并向学校训导处登记,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群社”首先从为学生谋福利着手,得到群众的信任,下设学术、康乐、时事、服务、文艺、壁报、歌咏等股,后来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举行时事报告会,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出版《群声》和《大家看》壁报,组织戏剧研究社、暑期夏令营、下乡宣传等活动,成了贯彻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活跃民主空气、团结广大同学与国民党反动宣传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前后共有六任社长,都是地下党员,社员最多时发展到400人,前后共有1000多人参加活动。它所组织的活动,不仅同学喜欢参加,曾昭抡等教授和一些青年教师也乐意参加。据一位助教回忆:“这里的民主小集会,自由的歌声,在在都给人注入了活力,往往在极端苦闷时,因了一个晚会而重新振作起来”^①。“群社”以自己各式各样、生动活泼的活动成为西南联大前期校内外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社团,并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充分肯定^②。1939年,联大工学院“社研”小组亦领导成立公开社团“引擎社”,也开展了类似“群社”的活动。

(五) 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方针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

^① 鲁溪:《我的教书生活》,载《联大八年》,7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② 袁永熙:《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载《云南现代史资料》第1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示《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①联大党组织斗争从此更加荫蔽。1940年末，云南省青委根据形势斗争需要，决定在西南联大建立二线党总支，二线总支对一线总支也保密，以便在一线总支被破坏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由云南省青委直接领导，一直坚持到1941年3月，总支书记先后由李之楠（李志强）、邹斯颐担任。

1941年1月，国民党挑起“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特务头子康泽来昆明，部署大逮捕，形势十分严峻。云南省工委指定由省青委书记杨天华负责，把比较暴露的联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共80多人，迅速疏散转移到云南省的个旧、蒙自、石屏、磨黑、弥勒、巧家、泸西、武定、禄劝等10多个州县荫蔽下来，开辟党的工作，为当地布下革命种子。如袁永熙到个旧任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李晨到泸西任中心县委书记，邢福津到蒙自任教，陈琏到个旧任教，古念良到武定担任武定、禄劝等八县中心县委书记，徐晃到弥勒担任县委书记，等等。同时，省工委指定熊德基为联大总支书记，领导留校的10多名党员，真正做到周恩来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尽力多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如中文系党员齐亮钻研功课非常刻苦，系主任罗常培很赏识他的才能，给他专门提出了很多课题进行研究。齐亮还针对当时物价高涨，学生伙食急剧下降的情况，主动挑起办好食堂的担子，起早摸黑到远地采购，使伙食大有起色，深得学生拥戴。又如联大工学院学生钟泉周^②，学习超群，服务精神动人，是全校最优秀学生之一。当时昆明流行一种地方病，外地的同学极易被感染，钟泉周千方百计向当地药农讨教，并取得祖传秘方，买了大量草药来煎汤，给每个同学一碗，有的还亲自端送到各人床头，苦口婆心地劝饮。许多同学感动地说，钟泉周具有“慈母”的心肠。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占领香港。从香港撤退时，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垄断中航飞机，将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7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钟泉周，“民青”成员，1945年西南联大毕业，曾任上海公交系统员工福利会理事长，领导工人运动，1949年2月被捕，坚贞不屈，在上海狱中壮烈就义，时年30岁。

人财产直至洋狗抢运到重庆，而许多滞港名流，包括陈寅恪先生等却无法及时撤离。后来，为此事，陈寅恪给友人写信说：“恪不如狗”。重庆《大公报》、昆明《朝报》对此事用《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的醒目标题进行揭露。指出：“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消息传出，引起大后方包括联大师生的极大愤怒。吴晗教授在历史课上讲课时，专门提到：“南宋亡国时有个‘蟋蟀宰相’^①，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1942年1月6日，在马识途（马千禾）、齐亮（二人均为党员，但此时尚未接上关系）等大一学生自发串联发动下，联大、云南大学等1000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孔祥熙这一罪恶行径，他们喊出了“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等口号，游行队伍中也混杂了一些与孔祥熙有矛盾的CC分子和三青团员，但这个运动在国内掀起了“反孔”怒潮，再次引起重庆当局的注意。康泽第二次来昆明搜捕，因受地方实力派龙云的抵制，未能得逞。1942年7月，云南省工委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决定采取对党员单线联系，横不越组，纵不越级，暂停发展，严格纪律，转地不转党等组织措施。马识途、齐亮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也因发动“倒孔”运动不符合党荫蔽精干的方针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教育，作了检查。到1943年底，联大党员由省工委直接单线联系的先后有35人，南方局直接联系的有6人，其他组织关系的有16人。

1944年9月，云南省工委郑伯克到重庆南方局汇报工作时，向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汇报了联大党支部周围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思想、学习、工作情况。王若飞表示够条件的就应该发展入党，那个只巩固、不发展的决定，已经不适应这种形势了。此后，联大党组织陆续发展了裴毓荪、萧松、李凌、李晓、许师谦（许寿谔）、严振、许乃炯、缪祥烈、彭珮云、尚嘉齐、李建武、胡聚长、杨立、江明、李海、吴征镒等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壮大了党的组织。

（六）团结进步教授

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先后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等来昆明加强对云

^① 蟋蟀宰相指贾似道，喜欢玩蟋蟀，著有《蟋蟀经》介绍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

南上层人士龙云等的统战工作,并加强对进步教授的团结教育。他们邀约民主人士,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并设立了“西南文献研究室”,该室由联大教授吴晗负责。联大教授经常参加活动的有曾昭抡、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吴晗、闻家驊等。研究会定期聚会,前后持续近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内容逐渐向讨论政治问题发展,后期着重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介绍毛泽东著作,对与会人员的思想促进很大。研究会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

1943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周新民等人协助筹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昆明支部。中共地下党员楚图南等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并团结发展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云南省支部,由罗隆基任主委,闻一多、潘大逵任宣传委员,吴晗任青年委员,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为委员。“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全体联大教授均加入了“民盟”。

与此同时,联大学生中地下党员骨干与进步教授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进一步密切。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洪德铭(洪季凯)、谭正儒、王念平、萧松等先是在“西南文献研究室”做资料整理工作,随后就经常与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沟通政治问题。在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他们通过闻、吴与许多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取得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党员骨干袁永熙、马识途、齐亮、吴显钺等,以心照不宣的政治身份和这些进步教授联系、沟通思想,在关键时刻取得了教授们的积极支持。

(七) 联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走向高潮

1944年,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中国战场上,解放区军民取得反“扫荡”战争胜利后,开始局部反攻。而国民党军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丢失大小城市146座,使日军一度占领贵州独山,大西南受到严重威胁,人心激愤。各地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腐败无能,进行公开的斗争。在党和民主人士的推动下,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持同情态度。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应不失时机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并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掀起新的民